

幸福理论基本问题探微

蒲德祥

(肇庆学院 幸福科学研究所, 广东 肇庆 526061)

摘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幸福研究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本文通过对幸福理论研究的梳理,阐述了幸福基础理论的主要观点、幸福的测量、幸福的影响因素,进而指出,明确界定幸福的基础概念、进一步完善量表的开发和测量、进行幸福的系统化理论研究及其对幸福进行动态化探讨是未来研究的趋向。

关键词:幸福;基础理论;测量;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4-0125-09

幸福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出发点和根源,也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主题。考察历史,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始于古典派经济学家所建立的政治经济学,然而他们讨论的主题不是幸福而是物质财富。随着经济学逐渐从伦理学中分离、经济学边际革命以及幸福水平无法量化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学家开始将注意力集中于主观满足的客观对应物上,用效用和偏好来替代幸福,使幸福研究逐渐淡出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直到“幸福悖论”的提出才使幸福问题重返研究者的视野。这样,幸福问题在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及心理学家当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且也获得了政府和公众越来越多的注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幸福思想由一种哲学思潮发展成为社会科学各领域的重要理论。鉴于此,本文力图通过对幸福基础理论、测量技术以及影响因素的分析,目的是为我国在解决民生问题有了物质基础上进一步谋求经济发展方式和国民生活模式的转变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增进人们的幸福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一 幸福的基础理论

幸福研究的基础理论解释了幸福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更深入、清晰地理解与洞察幸福的本质,形成了适应水平理论、期望水平理论、定值理论、相对消费理论、社会比较理论和偏好理论学说。各种理论解释模型从不同侧面理解幸福的作用机制,促进了对幸福本质认识的深化,也引发了对幸福本质的思考。虽然,目前幸福的理论模型还处于多元的探索时期,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有待进一步完善、整合与发展,但已显示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些理论进行介绍。

(一)适应水平理论

适应水平理论说明人们总能够不断适应各种变化。也就是说,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很快适应了这种生活,又会感到平淡无奇,快乐或幸福并没有明显增长起来。布里克曼(Philip Brickman)和坎贝尔(Donald T. Campbell)^[1]认为,收入增加,短时期内可以满足人们更多的物质和服务需求,使人们达到更高消费水平并带来额外幸福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慢慢适应这种消费和收入水平,额外

收稿日期:2010-12-15

基金项目:广东省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幸福教育视域下的高校教师发展研究”(编号:WYM09018)及肇庆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积极组织研究视野下的组织幸福研究”(编号:201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蒲德祥(1972—),男,四川合江人,肇庆学院幸福科学研究所所长、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幸福管理学、幸福心理学、幸福经济学和幸福哲学。

的幸福感就慢慢地消失了,也就是人们对经济条件改善的适应达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以至于这种改善对提高幸福水平都没能产生实际帮助。适应水平理论也有其很好的心理学基础。学者们认为,人们对重复出现的刺激反应会减弱,情绪系统对新事件的强烈反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这一理论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生活事件对幸福的影响很少。爱德华兹(Ward Edwards)认为,人们可以适应好的环境而感到不幸福,也可以适应坏的环境而感到幸福,这时只有事件的改变才可能再次引发情感的变化。另外,绪(E. M. Suh)等^[2]人发现,重要生活事件在3个月内就对幸福感失去作用,但有时人们并不能彻底迅速地适应所有环境,很多情况如贫困和丧偶的适应相当慢,而对噪音、饥饿几乎难以适应。弗雷德里克(S. Frederick)等对那些慢性病人和病情正在恶化的病人的研究,以及施特勒贝(W. Stroebe)等人对那些失去孩子、配偶的人的研究,都发现了适应缓慢的证据^[3-4]。适应水平理论认为,人们通常适应新的环境,从而调整他们的主观幸福水平,因而那种愉悦与快乐性适应可以减少一个人对不断出现的刺激的反应能力,但有时对痛苦与不快乐生活事件的适应能力很难。

(二)期望水平理论

期望水平理论认为,幸福取决于个人期望水平与实际处境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越小,人们越能感到幸福。人的期望总是在不断上升,达到一个目标后又会追求更高的目标。因此,收入增加仅仅只能在开始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当产生适应性后,幸福感又会下降到初始水平,因此又会追求更高的期望水平来增加幸福感。伊斯特林(Richard A. Easterlin)^[5]将收入欲望引入效用函数中,试图用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图来解释幸福悖论,他认为幸福水平不仅与相对收入有关,还与收入欲望的改变有关,他承认收入确实是带来幸福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在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收入的重要性就开始下降,而其他一些因素的重要性则开始显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期望值的升高(rising of aspiration);他后来指出,收入之所以只能给人们带来有限的幸福效应,是因为人有一种“享乐疲乏”(hedonic treadmill)的倾向。布伦诺·S·弗雷(Bruno S. Frey)和阿洛伊斯·斯塔特勒(Alois Stutzer)认为,个体福利是由欲望和成就之间的差距决定的^[6]。这

一结论不仅对源于物质生活的幸福成立,对精神生活中取得的成就同样适用。威尔逊(W. Wilsen)等^[7]提出,高期望值是影响幸福的一个重要因素,期望值和实际成就之间的差异与主观幸福相关,高期望值与个人实际差距过大会使人丧失信心和勇气,期望值过低则会使人厌烦;期望值本身并不能直接预测幸福,而期望值、现实条件与个人外在资源(权力地位、社会关系、经济状况等)和内在资源(气质、外貌等)是否一致,可以作为幸福的预测指标。期望水平理论表明,人们通常会根据自己的希望所形成的期望值水平来对他们所处的情形进行幸福水平评估。

(三)定值理论

该理论也称为幸福拐点理论(set-point theory)。定值理论认为,幸福本质上是先天性的东西,有些人天生快乐,有些人天生内向、郁郁不乐。其主要依赖于绝对的主观因素,例如性格、基因,或者通过继承而获得的容忍和克服生活困难的能力。换句话说,围绕生活波动的各种经历,存在一个特定的幸福水平。伊斯特林(Richard A. Easterlin)^[8]认为,即使经历了像彩票中奖或丧偶等影响人们幸福的重大事件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幸福又会逐渐恢复,尽管不一定能完全恢复到初始水平。因此,我们既高估了意外收入能给人们带来的幸福,也高估了意外灾难能给人们造成的痛苦,个人的幸福水平在长期内保持稳定。卡尼曼(Daniel Kahneman)^[9]认为,个体面临的改变生活的事件最终回到他们个性特征所决定的福利水平,有时通过产生好的或者坏的结果来恢复到这种特征所具有的福利水平。根据主观幸福感理论,在生命周期里,有一个实际上保持不变的幸福水平,因为在决定个人幸福水平中,个性和性情的变化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样的特征基本上是人所内生的。莱肯(D. Lykken)^[10]认为,健康、收入和美好的东西只是暂时影响我们的幸福,一旦人对这些事情反应后,幸福就回到由个性决定的基本水平。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者们声称,人有着内生的主观幸福感定值,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冲击只是暂时影响我们的幸福,在一件事情实际上影响我们的满意度之后的一个短暂时间内,我们不可避免地回到当初的定值。赫恩斯坦(R. J. Herrnstein)和墨瑞(C. Muray)^[11]认为,由于存在着一个不能被教育改变的天生的智力水平,所以社会计划

是没有用的。但有些学者对幸福的定值理论表示质疑。费尔普斯(E. A. Phelps)^[12]用一个个体的生命周期模型结合一个家庭的微观模型,分别观察了一个个体样本在5岁、31岁、41岁的家庭和工作满意度。她得出结论,个性存在连续性和变化。她假设连续性是一个附加过程的结果,她的经验结果与对爱和成就的欲望假设是一致的,并且从出生起就开始逐步提高工作能力,成年还在继续学习,受到母亲意见影响的度量把可归因于主体交际的结果和可归因于性情的结果区别开来。为此,她敦促采取政策来改善对儿童的关怀和培育父母与孩子之间健康的相互关系来提高人们的主观福利。

(四)相对消费理论

该理论认为,消费选择受我们和其他人的收入水平之间差别的影响,而不是考虑绝对收入水平。一个人消费水平的效用也依赖于相对收入水平而不仅仅取决于绝对收入水平。早期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发现,人们从收入、消费、地位或效用等方面与身边的朋友们进行比较。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3]发明了“炫耀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把消费看作是一个社会问题,最有意义的消费行为通常是在其他人的注视下公开进行的。杜森贝(James S. Duesenberry)^[14]提出相对收入假说,并且从经济计量学的角度予以验证,且提出了外部性的不对称结构,他认为一个人从他自己的消费水平同其他人的消费水平的联系或对比中,获得效用或者满意。也就是说,他认为,我们总是把自己同其他人比较,他们购买的东西影响我们对想购买的东西的选择。这就是常见的“邻居攀比”(keep up with the joneses)情形。赫斯克(Fred Hirsch)创造了一个新的术语“位置商品”(positional good),强调了相对社会地位的角色^[15]。弗兰克(Robert H. Frank)^[16]提出,那种以奢侈品的形式而生产的地位性商品,如格外昂贵的手表与游艇,是生产性资源的一种浪费,因为总体的幸福因此而有所降低并没有增加。因此,相对消费理论表明,一个人消费特定数量的消费品所产生的效用受到与他人比较的影响,即幸福水平取决于相对性而非绝对性。

(五)社会比较理论

社会比较理论认为,幸福取决于现实条件与某种标准的比较,它强调幸福是比较的结果,即幸福是相对的,取决于判断的标准。许多研究发现,与更幸

福的人比较会降低自己的幸福感,与更不幸的人比较会提高自己的幸福感。社会比较对许多领域内的满意感判断都具有较强的预测力。社会比较过程包括获得社会信息、思考比较社会信息、对社会比较作出反应,即认知、情感和行为反应。李(Gary R. Lee)等人假定,除了对自己收入的适应以外,社会参考群体的收入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17]。卢特默(Luttmer)认为,我们的幸福与我们的邻居的富裕程度成反比,如果你被富有的邻居包围着,就会感觉不幸福。伊斯特林(Richard A. Easterlin)^[18]提到了“关系外部性”,在这种情况下,外部性问题跟一个人生活的不同领域的相互影响相关,A在物质领域的努力影响A的关系领域,正如我们看到的,就幸福而言,这些关系领域是很有意义的。康恩(David E. Kaun)在调查中将那些具有同样人性特征(例如性别、教育和职业)的人群作为参照组,认为绝对的收入水平对幸福几乎不会产生任何效应,相对收入却起着重要作用,即所比较的人群的收入水平越低,人们的满意度越高。纽马克(David Neumark)和波斯威特(Andrew Postlewaite)认为,当一个人的配偶或另一名家庭成员的收入水平高于自己时,自己的满意度就会低一些^[19]。但迪纳(E. Diener)^[20]等认为,这个理论过于简单化,忽视了个人内部的其他标准。进一步说,有时人们通过和有成就的幸福的人比较而获得勇气和信心,与不幸福的人的比较却感到悲伤。因此,社会比较理论表明,幸福水平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因人而异。

(六)偏好理论

偏好理论认为,人们的偏好会受到他所在社会环境中其他人的影响。有相同的社会经济地位或工作的人,收入欲望相似;同一个社交圈的人,收入欲望也很相似。偏好理论着眼于习惯的形成等方面。习惯形成模型说明人的收入欲望是与个人的经历有关的。一般来说,个人过去的教育水平不同会造成他们收入上的差距,进而使他们产生不同的收入欲望。莱亚德(Richard Layard)假如人们采用一个更高的生活标准,他们无法选择回到之前的生活标准,也就不会拥有以前在给定的消费水平下所具有同样的效用水平^[21]。特维尔斯基(A. Tversky)和卡尼曼(Daniel Kahneman)^[22]认为,偏好是依赖参考的(reference-dependent)。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它们的影响不同。在生命周期开始阶段(未成年

时期),相互依赖偏好对收入欲望形成的影响要大,因为在这个阶段,有着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在一起学习、工作、娱乐,处于相似的环境,经历都差不多,所以他们的收入欲望受周围人的影响要大于自己的经历对自己的影响;在生命周期的成年阶段,由于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背景不同,他们的收入开始有了较大的差别,因而产生了收入欲望的差别,个人的经历对收入欲望的影响作用变得较大。偏好理论指出,人们所获得的一定数量的物品所产生的效用,部分取决于与其他人所拥有物品的比较而得到的满足感或失落感以及与过去经历对比的影响,排除人们获得效用的绝对水平。

二 幸福的测量

幸福研究经过了从描述到理论建构再到测量技术的完善与发展的过程。在其发展过程中,关于幸福的评估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众多的研究者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幸福的测量方法,测量技术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系统、从测量到评价,其演化与发展的轨迹,勾画出了幸福的概念与研究发展的脉络。实际上,从幸福的测量技术上看,早期对幸福的测量技术还非常简单粗糙,但对幸福的研究与实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随着对幸福的认识逐步深化,关于幸福的测量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众多的测评量表与多样化的评估技术,从而能够更加全面、准确、深入地揭示幸福的本质,促进幸福研究的深化。

幸福的最初量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他用一种独特的方法计算出,王者的生活比独裁者的生活快乐 729 倍。在漫长的人类思想史上,对幸福的度量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与幸福有关的问题一直被视为形而上学的专利。到了近现代,由于自然科学和经验主义认识论学派的兴起,宗教的权威开始下降,为功利主义学派在伦理学和社会科学之中的兴起,扫除了信仰的障碍并奠定了认识论的基础。在此过程中,休谟将培根和洛克开创的经验论、认识论发展到了首尾一贯的怀疑论,对自然法学派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这个时期,伦理学也开始从研究“神”转向研究“人”,从谋幸福于神转向谋幸福于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斯密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认为,经济发展应当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并用国民财富最大化解释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命题,从而为经济学奠定了功利主义的伦

理框架^[23]。边沁(J. Bentham)^[24]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并将幸福体验联系到“数”的意义。他依据强度,持续时间,确定性或不确定性,邻近或偏远,丰度、纯度、广度,对人们的苦乐进行计量。边沁的幸福研究虽然推动了幸福的数量研究与指数构建,但他由于过分注重构成幸福情感要素的量,因此他的研究受到了广泛的质疑。19 世纪 70 年代,杰文斯(Phillip Jevons)^[25]在边沁的关于幸福的数理意义的思想基础上,建立了边际效用理论。他把边际思想引入功利主义经济学,将人类理性、计算效用最大化的功利主义观以数学术语表述幸福、快乐的概念。他认为,经济学就是幸福与痛苦的微积分,即以最小的痛苦换得最大幸福的一门学科。杰文斯对幸福研究的贡献在于,财富与价值的性质要用无穷小的快乐和痛苦以数学方式来加以解释。但由于他将经济学问题的数量化方法引入道德哲学的苦乐研究之中,从而失去了对现实经济的人文考量。继此之后,马歇尔^[26]在《经济学原理》开篇中指出,经济学既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他认为,对人的研究主要研究人类的两种动机:追求满足和避免牺牲。在人类经济行为中,前者促进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后者则制约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虽然人类的动机从性质上讲是无法衡量的,但其满足和牺牲的程度或者在数量上却可采用某种间接的方法——货币作为标准来衡量。因此,经济学主要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动力和阻力,这种动力和阻力的数量只能用货币来进行衡量。可见,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必须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并研究人类本性不断变化背后的微妙的力量,但考虑到幸福和快乐的主观性以及计量上无法直接测量,用“满足与牺牲”代替了“幸福与痛苦”。总之,这一替换使经济学从价值分析转向了对货币的分析。不过,他认为,这一研究转向并没有违背经济学的伦理和价值判断,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和出发点依然是幸福。实际上,这一替代使得经济学越来越偏离人类幸福这一终极目标的发展之道,取而代之的是数量经济学对财富至上论的追求和痴迷。主流经济学完全排除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和出发点,排除了经济学的客观性的价值概念,不再探讨人类经济行为的欲望问题,幸福遭到主流经济学的彻底离弃。

20 世纪 20 年代,福利主义开始兴起,庇古^[27]认

为,经济学的宗旨是一种改善人类生活的工具,而不是一项体育运动,人类既将自己作为活着的目的,也将自己作为生产的工具。一方面,人被自然与艺术之美所吸引,其品格单纯忠诚,性情得到控制,同情心获得开发,人类自身即成为世界伦理价值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其感受与思想的方式实际上构成了福利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人可以进行复杂的工业操作,搜求艰难的证据或者改进实际活动的某些方面,成为一种非常适合生产并可以提供福利事物的工具。人类为之作出直接贡献的前一种福利就是非经济福利,而为之作出间接贡献的后一种福利就是经济福利。人类为之作出贡献的福利乃是指能给人们带来满足的一切东西,它不仅包括对财物的占有,还包括知识、情感和欲望的满足。但庇古认为,其中许多满足是无法计量的,因而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进而排除了对非经济福利的研究。经济学所研究的是经济福利,即那些与人类经济行为有关的效用的满足,它们是可以货币直接或间接衡量的福利。为此,庇古提出了边际效用基数论并坚持马歇尔以货币计算效用的观点,认为效用可计量,可比较大小,可加总。新福利经济学则认为,效用无法用具体数值来衡量,当然个人所得到的效用更没有可比性,因而只能用序数表示出效用水平的等级。新福利经济学基于序数论用社会福利函数来表示人们的最大化幸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萨缪尔森提出的“幸福=效用/欲望”的方程式,以此来计算人们的幸福度。新福利经济学基于帕累托最优概念和一般均衡理论,构建了一套关于自由市场的竞争、均衡和最优状态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表明了社会从资源和财富分配中所能获得的最大福利,即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幸福”理论实践上的可能性。可见,新、旧福利经济学关于幸福和快乐的指标主要用货币来表示“效用”或“福利”,均没有尝试对幸福进行直接的经济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行为经济学倡导并注重将经济学与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它大量采用心理分析法,以现实为基础对人类经济行为进行研究,揭示了人们在实际的现实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行为与传统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人、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等一系列理论的偏离。为此,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的快乐与幸福水平,既不是来自最大化理性原则,也不是市场的最大化均衡的结果,而是对市场最终的满意

化结果的整体体验。这为主流经济学建构了一个充满人性和人类价值的理论框架,使经济学成为人的科学,人成为经济学的主体,从而确立了经济学领域向幸福研究的回归。回归幸福的经济学,标志着主流经济学的价值观念由“以物为本”的财富观转为“以人为本”的幸福观、由理性人研究转为行为人的研究的变化趋势。弗雷等人则针对功利主义仅仅注重幸福的结果而忽略通向结果的必经过程提出了应当超越边沁、给予过程效用应有的关注的理论。过程效用的提出是对幸福概念的重新解读,它既坚持了功利主义哲学的幸福内涵,又坚持了经济学关于幸福效用化—效用物质化—物质化效用数理化的幸福内涵,以更加全面的视角反映了幸福的本质。

随着经济学对幸福研究的离弃与回归,心理学、社会学、生态环境学等各学科也对幸福问题进行了研究。心理学家早期用于度量人们幸福的主要方法是运用传统的问卷调查,其他心理学家试图通过追踪在大脑不同区域电磁波的振幅和频率来测试情感幸福。现代心理学对幸福的研究始于积极心理学运动的兴起。积极心理学是利用心理学目前已比较完善和有效的实验方法与测量手段,来研究人类的力量和美德等积极方面的一个心理学思潮。积极心理学以幸福理念为核心,致力于帮助人类发挥潜能和获得幸福,倡导一场幸福革命,其中以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丹尼尔·卡尼曼为典型代表,他提出了用日重现法来测度人们的幸福度。他通过借鉴与引入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引导人们回忆、再现有关快乐和幸福的状态,从而证明快乐与痛苦的体验效用是可测度的。社会学认为,世界各国把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准设定为“经济增长”,但理论与实践经验表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不具有同步性,财富增长并不意味着人类幸福。由此人们开始意识到,国民的快乐与幸福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因此,社会学视角中的幸福研究认为,可通过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来达到对整个人类的终极命运的关怀,其主要表现为主观生活质量指标和客观生活质量指标的构建过程。近年来,生态环境学开始倡导和重视环境对幸福的影响,生态环境学家认为,一国的环境政策对一个社会中的公民的幸福水平会造成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英国新经济基金和地球之友的组织联合发布的最新衡量幸福的指标——幸福星球指数。幸福星球指数从生态环

境角度出发,以资源作为投入、幸福作为产出并最终实现人类幸福为发展目标。它由生活满意度、平均寿命和生态足迹三个基本主客观因素来测量。这个指数反映了人类幸福与环境影响的测量指标,反映出各个国家在达到这个目标过程中的不同表现,也反映了科学发展观下的两型社会的要求。幸福星球指数肯定了对地球资源低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肯定了那些有效利用资源的国家或地区。

在华人经济圈中,著名“快乐经济学之父”、经济学家黄有光^[28]认为,福利经济学中的“福利”就是快乐与幸福,快乐与幸福是人类经济行为的终极目的。他认为,对幸福的研究应该涉及经济学、生物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他强调,政府在扩大公共开支、改善宏观制度安排方面,增进公平与人们的幸福感的积极作用。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倡导建立幸福学,并致力于最大化人们幸福的研究。他提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幸福的最大化,并对中国六大城市的幸福指数进行了测算,测试表明,同一城市里和跨城市之间的财富对幸福的影响是相对的。我国的傅红春、陈惠雄、邢占军等学者从90年代开始对幸福进行研究。傅红春于2007年初对上海等10省市进行了收入满足度与生活幸福度的调查与分析^[29]。陈惠雄以趋乐避苦为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力,指出快乐或幸福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标和真谛,并在全国大城市开展了幸福指数的实证研究^[30]。邢占军根据体验论、主观幸福感理论,从我国的文化背景和当前的社会实际出发,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由十个次级指标构成的我国民众幸福指数指标体系^[31]。这些研究为中国幸福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哲学家和传统经济学家确信,效用是拥有内涵并可以测量的,人的福祉由主观幸福组成。新福利经济学从1930年开始以一种革命性的方式改变了传统经济学,认为效用的内涵全部被去除,最后被归结为一种能够显示行为的偏好指数;其次,人们根本没有办法科学地衡量基数效用;另外,人们借助序数足以产生合适的经济理论定理。随着心理学的新探索,并在其它学科新发现的支持下,效用再次被赋予了内涵:效用能够也应该在主观福祉的形式下从基数的角度予以衡量。实际上,个人偏好和幸福最终被证明是非常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也许存在着十分系统而显著的差异。但幸福测量希望通过一份调

查问卷就能达成对幸福水平全面而准确的把握,实质上是幸福测量的简单化。将幸福简单化为效用产生了严重的解释性问题,原因在于工具性的缺失以及对幸福的理解涉及哲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对这种复杂的主观世界要用数量化的工具来加以测量和说明,无疑是对现代科学局限性的提出一个重大挑战。反之,在一定意义上,幸福测量成为发展、实践具体体现人文精神和终极价值追求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是一种具有普适性并能社会发展进程中加以实现的有效方式。它把自古代以来思想家们关于人类幸福的形而上学思考变成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可以实际操作化并可以具体测量成效的方法体系,这一点正是幸福测量最深刻、最丰厚的发展理论内涵之所在。

三 幸福的影响因素

弗雷(Bruno S. Frey)和斯塔特勒(Alois Stutzer)多次指出,衡量幸福的主要目的不是对主观福祉的水平进行对比,而是辨别影响幸福的各种决定因素。研究者们认为,应该从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政治学加以说明。其决定因素分别为:经济因素,如个人收入、总体收入、失业和通货膨胀;个性因素,如自尊、自控、乐观和心理健康;社会人口因素,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教育水平;情形性因素,如具体就业和工作条件、工作单位的压力、与同事亲戚朋友的人际关系以及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体制性因素,如政治权力的分散程度和公民的直接参与政治权利等^[32]。经济学显然更多地关注影响幸福的经济因素,如收入、通货膨胀、就业、分配以及自由交易,其中收入、通货膨胀、就业这三个因素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但这些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并不是一种线性的关系,而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结构。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因素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时,其方法更多地依赖于客观数据,这些数据既包括总量的统计数据,也包括在问卷调查和实验中所获得的个体数据。实际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单一的,在解释这些经济因素与主观福祉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有时不可避免地带有直觉的成分。心理学更多地关注影响幸福的个性心理因素,如人格、自尊、自控以及外向性和神经质。这些因素在各自的领域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心理学对它们积累了许多事实方面的认知,同时心理学也很清楚应用这些因素时可能出现的不足。其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进

行测量的时间点上,人们所表达的生活感受,是否能够代表他们在一个时期里的总体生活感受。社会学视角认为,人类幸福的源泉是通过在一个社会群体中的相互比较而获得的。人类在婚姻、家庭、社群、宗教团体中所获得的幸福会比单一的个体所获得的幸福要多。实验性的发现已经证明,拥有亲密的朋友、事业伙伴、亲戚、稳定的婚姻和家庭关系,或者作为某个团体的成员,会给一个人带来极大的幸福。人类学和管理学更多地关注影响幸福的情形性因素,如工作条件、社会关系以及文化等。人类学和管理学把工作条件、社会关系以及文化因素看成幸福的充分条件,并认为这些因素不管是从源泉还是从途径上看,都决定着人们的价值观并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水平。政治学主要关心的是影响幸福的制度因素,如不公平的制度、政治权力的分散程度以及公民直接参与政治权利等。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民对政策效果的评价、公共决策程序的民主性和参与性、公共政策执行者和制订者的受欢迎程度、公民权利的受尊重程度等,都会对一个社会中公民的幸福水平造成影响。政治学试图表明,幸福不仅存在于个人领域内,而且宪法安排以及具体的制度都会对人们的幸福水平产生关键影响。

鉴于幸福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幸福与影响因素关系的复杂性,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幸福的影响因素。当然,这些学科之间互有重叠的研究领域,我们并不能严格区分。可见,这些研究丰富和完善了幸福理论,但未来研究中应关注的是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问题及其直接作用和调节作用的机制问题。因此,在幸福研究的前期基础上,建构幸福理论与解释模型,从而更加深入理解幸福的作用机制,仍然是一个有待努力的方向。

四 幸福研究亟待深入和拓展的问题

幸福研究在国内外都是有着重要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的课题。幸福研究的思想源远流长,但研究者们所作的关于幸福系统的研究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许多重要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它们可以作为将来研究的启示。如截至目前,学界对幸福的概念、结构、维度划分等基础性问题都还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幸福的实现方式和心理机制是人类所共有的,还是不同文化所特有的,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是普遍争议的问题,这更增加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也进

一步确立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首先,幸福的基础概念界定。虽然哲人们一直在探索幸福问题并回答如何增进幸福,但目前幸福研究在经济学领域才只是刚刚开始,尚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们对幸福的定义也是处于争议之中,而且存在偏颇,大多数学者只看到了其中的一个或两个方面。正如迪纳(E. Diener)所言:虽然人们已经对幸福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有了相当的了解,但幸福主题本身仍然存在众多值得研究的地方^[33]。源概念的认知分歧必将使不同学者的研究丧失一个可以比较的平台。因此,要实现幸福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提升,应建立在幸福本身尤其是其内涵、结构、维度明确的基础上。由于幸福内涵丰富,涉及多个层面,不能单纯用一个变量展开研究,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区分幸福的维度,探讨幸福内在各维度与其他变量的相关和因果关系,从而对实践应用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其次,幸福的系统理论研究。目前,对幸福的研究较少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进行幸福的前因后果的系统研究。在有限的采用实证研究的文献中,往往只考察了幸福与为数有限的几个影响变量的关系,即人们对影响幸福的系统变量的忽视。人们只是关注金钱、收入等的增长与攀比,而忽视了健康、亲情、生态、人际关系、社会公正、公共福利等因素造成的影响。而现实中,幸福是多个变量影响的结果,与这些变量都具有明显相关性,因此只研究一两个变量,而控制大部分变量的做法,很难得出可靠的结论。所以,如何构建一个系统综合模型,全面系统地研究幸福的影响因素、调节因素、结果变量等,以及是否存在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三,幸福量表的开发和测量。鉴于幸福水平本身的主观性与不稳定性,首先需要对幸福本身做出科学的度量。当代幸福度量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以心理学研究为基础,侧重于研究微观个体的幸福感;另一类以经济学研究为代表,侧重于度量宏观总体的幸福程度,典型方法为核算国民幸福总值。但从目前来看,对国民幸福总值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份真正国民幸福总值调查报告,相比较而言,幸福指数的测量已经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另外,幸福度量的两种方法如何相互转换以及把量表应用于特定领域仍缺乏研究。再有,在跨国研究中

应用更先进的评估衡量方法以及完善幸福的衡量方法也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在国内外均缺乏成熟的幸福量表的情况下,可以使量表的开发有助于人们摆脱以前主观判断可能带来的偏差,使理论研究成果更具客观性和普适性。

第四,幸福的动态变化研究。人们幸福水平的最大化是指幸福水平在整个时间段上的最大化,而

绝不仅仅是某一时点上的最大化。换言之,幸福水平最大化的研究应当建立在动态分析的基础上,这对于人们的幸福水平更具有实际解释力。结合当前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和构建和谐社会背景开展幸福研究,对于丰富和谐社会理论、构建科学发展观、最大化人们的幸福水平、帮助人们适应社会经济转型等更具有时代意义和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 [1] Brickman P. & D. T. Campbell. Hedonic Relativism and Planning the Good Society[C]//Mortimer H. Appley(ed.). *Adaptation Level Theory: A Symposiu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1.
- [2] Suh E, Diener E, Fujita F. Event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nly Recent Events Matter[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6, 70(5): 1091-1102.
- [3] Frederick, S. & G. Loewenstein. Hedonic Adaptation[C]//Daniel Kahneman, Ed Diener, Norbert Schwarz (eds.). *Well-Being: The Founda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9.
- [4] Stroebe, M. S. & W. Stroebe, Robert O. Hansson. *Handbook of Bereave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M]. Cambridge U. 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5] Easterlin R.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C]//David P, Reader M.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witz*.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 [6] Frey, B. S. & Alois Stutzer. Happiness,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J]. *Economic Journal*, 2000, 110(446): 918-938.
- [7] Wilson, W. J. *When Work Disappears* [M]. New York: Knopf, 1996.
- [8] Asterlin R. Explaining Happiness[J]. *Proceeding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3, 100(19): 11176-11183.
- [9] Kahneman, Daniel. Objective Happiness[C]//Daniel Kahneman, ED Diener, Norbert Schwarz(eds.). *Well-Being: The Foundation of Hedonic Psych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9.
- [10] Lykken D., Tellegen A. Happiness is a Stochastic Phenomenon[J].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96, (7): 186-189.
- [11] Herrnstein, R. J., Murray C.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 [12] 布鲁尼, 波尔塔. 经济学与幸福[M]. 傅红春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13] Veblen T.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M].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899.
- [14] Duesenberry J. *Income, 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 [15] Hirsch F..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M]. London: Routledge, 1997.
- [16] Frank R. *Choosing the Right Pond*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17] Lee R. M., Brooke L. Dean B. L., Kyoung-Rae Jung. Social Connectedness, Extravers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esting a Mediation Model[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8, 45(5): 414-419.
- [18] Easterlin R. A. 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95, 27(1): 35-48.
- [19] Neumark D., Andrew Postlewaite. Relative Income Concerns and the Rise in Married Women's Employment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8, 7(1): 157-183.
- [20] Diener, Ed, Sandvik, William Pavot, and Frank Fujita. Extravers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a U. S. National Probability Sample[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1992, 26(3): 205-215.
- [21] Layard, Richard. Human Satisfaction and Public Policy[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80, 90(363): 737-750.
- [22] Tversky A., Kahneman D. Loss Aversion in Riskless Choice: A Reference Dependent Model[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1064.
- [23] 斯密. 国富论[M]. 唐日松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 [24]边沁. 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 时殷弘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25]杰文斯. 政治经济学理论[M]. 郭大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26]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M]. 廉运杰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 [27]庇古. 福利经济学[M]. 金镛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 [28]黄有光. 社会福祉与经济政策[M]. 唐翔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29]傅红春. 满足与幸福经济学[M]. 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 [30]陈惠雄. 快乐原则——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 [31]荆占军. 测量幸福——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32]弗雷,斯塔特勒. 幸福与经济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33]Diener Ed. Subjective Well-being——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proposal for National Index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55(1):33-43.

An Exploration of the Elementary Problems of Happiness Theory

PU De-xiang

(Institute of Happiness Science, School of Education, Zhaoqing University, Zhaoqing, Guangdong 52606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living standards, happiness research is increasingly turning into a focus problem in the economical world.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happiness and the main points of theoretical basis on happiness, and analyzes the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of happiness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happines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ed studies, this paper thinks that future research trend in this field should clearly define the concept of happiness, further improve the scale development and measurement, and carry out systematic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of happiness to explore the dynamics of happiness.

Key words: happiness; basic theories; measurement; influence factor

[责任编辑:刘萍萍]